

科苑往事

巴甫洛夫学习运动中的一场风波

■熊卫民

【在强调“出成果”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历来重视“出人才”问题。在抵御“左”的干扰，营造宽松氛围，尊重、关爱、保护人才方面，许多院、分院、研究所的领导都留有佳话。】

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对该所副研究员刘育民的保护即是其中鲜为人知的一例。

事情得从巴甫洛夫学说学习运动说起。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号召中国生物学界“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学”,以及因它的“指导”而获得“伟大的成就”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等。中国生物学、医学界广泛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运动由此起步。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央卫生部于1953年8月21日至9月29日在北京举办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以下简称学习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07位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各科教授,研究人员及临床高级医生和163位旁听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认真地实地钻研巴甫洛夫经典著作”,并撰写了学习总结。

跟其他学员一样,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年仅32岁的副研究员刘育民向学习会提交了学习心得。结

果,他那份并非仰视,而是对巴甫洛夫提出了商榷意见的心得让某些人感到不快。基于“刘在学习中一贯消极,态度始终没有端正,在写心得时更坚持其错误的看法,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对全国生理学界来说应有思想领导的责任”,学习会“建议科学院对刘育民进行教育,并考虑展开讨论”。

1953年12月初,中科院把学习会的工作报告转给了生理生化所,指示该所对刘育民所写的《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以后》进行讨论,并将结果报院。批不批判刘育民?这是摆在所长冯德培面前的一个问题。不处理在学习苏联运动出现的这起涉嫌“反苏”“反对巴甫洛夫”的事件,中科院的有关领导和他都将承担不小的政治风险。可如果顺从学习会的建议批判刘育民,又很可能会断送这个青年科学家的前程。

冯德培深知刘育民的个性和才能。刘于1946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冯德培的领导下工作。他对政治缺乏兴趣,只关心科研工作。他实验技术很好,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很有培养前途,1952年就晋升为副研究员了。

冯德培也熟悉巴甫洛夫的学说。1949年9月,作为中国生理学界的代表,他曾亲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可他不愿意盲从任何权威,并不承认巴甫洛夫学说能概括全部生理学。

冯德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2月9日,他在研究所主持了一个报告会,并致开会词说:“今天,我

们请刘育民同志报告。一方面是继续我们原定要做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执行院方的指示,因为北京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对刘同志的学习心得有意见,要我们讨论。院方鼓励学术上自由讨论。我们只希望把刘同志的文章搞清楚。如果它有错误,主要的错误在哪里?这个要求应该是这个会所能达到的。”

整个会议得以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并未把学术思想上的认识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对刘育民进行人身攻击;而刘亦可答辩,可解释,可保留意见。最后,冯德培作总结发言说,刘育民文章的问题已经大体上搞清楚了,而刘本人也基本接受了同志们意见,会议达到了原定的目标。

1954年1月28日,生理生化所将刘育民问题的讨论结果上报中科院。4月12日,又将其转给了巴甫洛夫学说研究会。刘育民事件到此算是较好地解决了:生理生化所给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研究会面子,而刘育民尽管一度有些消沉,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不久,冯德培派遣他去瑞典进修一年,他又变得重新精神焕发起来。

在处理刘育民事件上,冯德培是有勇气、有智慧的。在“左”的倾向占主流、不是依照法律而是依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的时代,对于来自外界的“左”的干扰,完全不予理睬是不现实的。但通过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明批评、暗保护,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冯德培守住了自己的良知。

致昆明

■海男

我要陪同你擦干净火车站的血腥味
那弥漫在红嘴鸥翅膀下、樱花树下的血腥味
我们伸出手来一起擦,强忍住悲伤的泪水一块擦
用衣袖擦、用弹叶片擦、用疼痛擦……
我要陪同你寻找黑暗的敌人
无论他们藏在老鼠洞、禽兽洞、十八层地狱
都要将他们擒获,让他们接受真理的审判
让他们归于魔,死于人民的唾弃和子弹
我要陪同你的英雄、伤痕累累的城市和兄弟姐妹们
度过这一幕幕黑暗笼罩的长夜
我要陪同你度过这些惊悚和恶梦交织的记忆
度过这喘息、焦虑、悲伤的时境
我要陪你去爱那位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英雄
我要陪同你去爱那位高声叫喊来砍我吧的勇士
我要陪同你去为爱而超度逝者或拥抱受伤的人们
我要陪同你在这个春天寻找我们失去的春光
我要用一个诗人纤弱的灵魂来拥抱你
亲爱的昆明,我要陪伴你,度过暗夜,寻找到真理
我要陪同你从黑暗的暴力下寻找着春光四射,繁花锦绣



图片来源:昵图网

失衡的南朝(22)

【“勿生帝王家”毕竟不是与生俱来的觉悟,而是从权力高处跌落时的悔不当初。】

南朝宋孝武帝在位期间,对自己的第八个儿子、新安王刘子鸾最为宠爱,“凡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国”。前废帝刘子业甚为忌恨,泰始元年(公元465年),派人将其赐死。年仅10岁的刘子鸾死前对左右说:“愿身不复生王家!”(《宋书·孝武十四王》)

无独有偶,14年后,公元479年4月,宋顺帝刘准继位于齐王萧道成。将军王敬则率兵上殿,年仅11岁的宋顺帝惊恐万状,躲进佛龛之下。太后深恐祸及于身,亲领太监找到他交给王敬则。宋顺帝擦干泪水,胆怯地问:“欲见杀乎?”王敬则说:“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亦如此。”顺帝“泣而弹指”,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不久被害。(《资治通鉴》卷135)

“勿生帝王家!”千百年来,如此痛心疾首的话,说过的人不知凡几。

勿生帝王家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运行体系中充斥着不择手段,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拥有权力就等于拥有一切,可以颐指气使,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颠倒乾坤。人性中恶的成分因为有了权力的鼎力支撑,而得以无约束地膨胀。只要权力足够大,背景足够深,即便是父夺子妻的乱伦丑剧也会被美化成令人陶醉的绝世之爱,即便是涂炭生灵的独夫暴行也会被巧饰成令人拜服的创世伟业。与此同时,权力获取的途径与机制也缺乏足够的正义与公平性,如同一婆张牙舞爪的螃蟹,个个奋力攀爬,人人缠斗不休,明枪暗箭,钩心斗角,心狠手辣,巧取豪夺。为了保住权力和地位,更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中国的权力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染缸和绞肉机,不仅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濡染成为龌龊不堪的权力机器,还让其中的许多人在权力的博弈与绞杀中变成毫无价值的牺牲品。那些慨叹“勿生帝王家”的天子贵臣、皇亲国戚们,或在权力搏杀中丧生,或在君恩衰退中失势,或在自作孽中不可活,或在朝代更迭中被碾压,都是权力角斗场上的落败者和

牺牲品。对于权力搏杀的冷酷与残暴,他们感受得最为真切,也最为痛彻,故而他们的慨叹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理解。

不过,“勿生帝王家”毕竟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觉悟,而是从权力高处跌落时的悔不当初。在此之前,他们只会高居社会食物链的顶端,甘之如饴地享受着权力的魔法所带来的荣华富贵,只会会在社会丛林法则中毫无悔悟地践行着厚黑二字。就像如今的贪官,在位时吃拿卡要威风八面,落马后才乞求愿为农民稼穡耕种一样。如此悔悟,显然是无法消除权力逍遥带给后人的诱惑的。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如此痛悔之言虽然不绝于耳,但权力场依然如同充满诱惑与魔力的迷宫,强烈地吸引着人们沉迷于权力场上的拼斗与搏杀。

由此看来,“勿生帝王家”的王室悲叹,和“愿为农民丁此残生”的贪官祈愿,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也并不值得后人之为同情与怜悯。进一步说,感慨时代造就了一茬又一茬的官场倒霉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更应该深思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患上了什么样的顽症,以至于让一代代人飞蛾扑火一般冲进权力搏杀的滚滚洪流。

从“都教授”看东亚女性的男色盛宴

■马小盐

【都教授这样的一个人,本质上已经不是男人,而是女性们日思夜想的完美之物。他大可大可,可老可少,可做爹,可为儿,可飞行,可静默,可令时光顿停,可美貌与智慧并重。他无所不能,他是一切的一切,他完全可以令女性粉丝为之茶饭不思、神魂颠倒。】

最近,谁若没有看过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便有脱离时代的危机。在长腿欧巴李敏镐激起的韩流尚未平息之际,“都教授”略显稚嫩的正太面孔再次以龙卷风的方式席卷各大时尚媒体。面对气势如此汹涌、蓄意迎合女性感官的韩流文化,我们很有必要探求一下它的造魅原理。

从2005年超女冠军获得者李宇春身上可以看出,大多中国女性欣赏中性美。中性,性别不明,站立在男女性别分界线上的人。但这不是中国女性

独有的审美观,似乎整个东亚大陆的女性皆是如此。东亚女性理想的梦中情人,多半不是硬汉型人物,而是具有柔美面孔的中性人。男人爱萝莉,女人喜正太,是东亚大众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大量日本漫画中的男主角长着一幅少女的面孔,而韩剧中的男主人公则往往呈现出一种暧昧难明的中性风。这多半得力于近些年东亚女性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女人,尤其是有钱有闲的女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自己的审美观判定:什么样的雄孔雀能够愉悦她们的眼眸,什么样的开屏方式可以博得她们的首肯。她们开始成为男色鉴赏人。

美少年之美,是古希腊文化与东方古典文化皆有的一个美学主题。但古希腊文化中的美少年阳刚气质颇浓,他们喜好运动,喉结突出,肌肉壮硕,唇上富有蒲公英一样的柔毛;胡子。东方文化中的美少年则多以阴柔形象出现,从潘安到贾宝玉,无论历史人物还是经典文学形象,美少年多是缺乏男人气的一种类女性衍生物。东亚女性嗜好中性美的这种趣味,几乎是对东方古典男同性恋

审美观的一脉相承。只是,男同性恋将阴柔男性当作女性的替代品,而东亚女性则将之看作真正的男人。她们真的将中性男看作男人,并在爱男性、恋他者吗?在我看来,东亚女性对中性男的这种难以解释的爱恋,是一种镜像反应,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恋。这是一种叫喀索斯症,嗜好自拍的她们,无法反观自身,无法时时看清自己的脸,便想在理想男性的躯体上片刻不停地搜索到自己的面孔。

韩国偶像剧是中性美在东亚大陆的最大生产线。这些商业化的影视公司,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便蓄意打造大量此类偶像明星。无论李敏镐还是“都教授”,皆长了一张中性化的面孔。他们以男非男,似女非女,俊逸出尘,超越性别。扮演“都教授”的金秀贤,便是此中楷模。只看广告,他那稚嫩而女性化的面孔,令人怀疑《来自星星的你》是一场关于正太与女王的言情戏。而他偏偏演绎的是一个来自外星的、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00多年的男人。正是这样的角色,才堪称十全十美。因为他既可以满足女性观众的恋情情结(他400

小红庙随笔

【30年前我刚到北京工作。去机场接老外如果遇上早晨的活儿,司机总会对我说:让我喝罐酸奶再走吧。】

那是白瓷罐子装酸奶,不是今天超市里卖的“优格”洋酸奶。今天的酸奶太细腻,就像今天超市里的水饺塑料感太强。老北京的酸奶有木渣感。好那口的司机很奇怪他请客居然我不领情:“还有不喜欢喝酸奶的?!”

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说不喝豆汁儿不算北京人。磁器口豆汁儿店还在磁器口的时候,我尝试过,没有其他外人尝过后的不适应;不过,就跟焦圈试吃过程一样: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焦圈的颜色倒是挺诱人的,形状有点像洋人的鱼翅圈。

北京的炒肝是我的最爱。曾经有一位江南的朋友十分不理解北京人怎么喜欢吃这种大蒜酱油大肠猪肝淀粉的混合物,更不理解“卤煮火烧”:“那东西怎么能吃!?”我喜欢酱油味道和蒜味道足的炒肝,最好刚出锅的,以为那是人间美味,不配包子也好吃;卤煮火烧我则喜欢里面的经油炸过的豆腐和豆腐乳的汤料,烧饼充饥也不错;北京的“小肠陈”是引起人“乡愁”的品牌店,最好是位于达智桥胡同附近的;华灯初上,寒冷的冬夜,街面上最好有卖鞋袜之类或者冰糖葫芦之类的夜市。夜宵的人吃一口肉沫烧饼,来一块大头菜杈当美味。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赶上“咬春”,街上有人推着车卖“心里美”萝卜,大个儿,上绿下白,在白处切棋盘状口子,劈进去就是口条,掰一根嘎嘣脆,甜,色也红得诱人。北京人管吃春饼也叫“咬春”,那是另一种果腹的美味,需要大葱炒鸡蛋、肉末粉丝佐配才好。

居京卅年,我学会了秋天满市场找新炒的怀柔油果子,学会了吃房山的新鲜柿子。如今,北京应季的干果还有传统零嘴的风味,卖的方式也传统,是北京秋冬的一道生活风景。牛街的炒果子跟牛肉包子一样有名。西什库教堂门口和地安门的炒果子也不错。

北京人吃的驴打滚和豌豆黄近来少有做得好的,也可能是我的口味高了;艾窝窝的味道还有原来的意思;比较讲究一点的糖葫芦倒是出现在大超市的收银台口,街上卖的少有质量好的。

北京的锅贴比包子饺子做得好的多,一般专门打招牌卖锅贴的都还靠得住;北京的烧卖现在做得太油腻;北京的小米稀饭就锅贴加咸菜是人间美味。咸菜最好是大头菜,酱红的,原色的都好,讲究要切成丝,拌小磨香油。要用粗碗,英国细瓷日本细瓷都不好,最好是《红高粱》里的海口粗碗。

碟碟不休

“复数”的小津

■韩连庆

【小津电影的视角不是哪个人物的视角,而是“物”的视角,仿佛上苍在“凝视”芸芸众生,这就带有了“超验”或宗教的意味。】

聚会上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30多岁,中文说得极好。闲聊时谈及电影,让我颇感惊讶的是,他竟然不知道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是何许人也,忙问我小津拍过什么电影,我说一般公认他的代表作是《东京物语》。这部电影他倒是听说过,问我是不是最近才拍的,我略带丧气地说,小津去世已半个世纪,《东京物语》是1953年拍的。

我起初对这位日本朋友不知道有小津这位著名的同胞而颇感失望,不过后来想想也就释然。我们看待另一种文化总是带点“异域的印象”,挑选那些自己感兴趣的,说不定这位日本朋友也熟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中国文化。

我最初还是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天书”《电影2:时间—影像》中知道了小津安二郎。德勒兹认为,小津的电影缺少戏剧性,镜头固定不变,构造了一种纯视听的情境。他的电影中还充斥着各类静物,例如花瓶、自行车,这些静物是时间的纯粹和直接的影像。

德勒兹这些“云山雾罩”的话既让我对小津产生了兴趣,又对小津“望而生畏”,买了一堆小津电影的光碟,一直束之高阁,直到有一天闲极无聊,想瞅瞅小津的电影到底如何,就把小津1951

北京人的油饼原来是早点摊上的一道风景,现在恐怕得去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才能吃到。我15年前跟两位同事在新墨西哥州就吃过地道的油炸饼,跟老北京油饼一个味道。豆腐脑就油饼,也来点咸菜丝,比燕窝鱼翅好吃。

北京人喜欢吃茶叶蛋。可惜现在买到的大抵是卤蛋,不是真的茶叶蛋。茶叶很便宜,为什么不做茶叶蛋?还是我没有找到?

北京时髦的女孩子喜欢吃麻辣烫。对此我十分不解。麻辣烫吃了不会发胖?麻辣烫是北京小区下晚的一道风景。赶上城管那就是“警匪片”里的场景了。

北京人酷爱熟食,酷爱各种酱肉,酷爱各种香肠粉肠肉肠。有一天要是把蒜肠灌肠断了,北京人会像芝加哥工人断了啤酒一样走上街头抗议的。

北京人喜欢去稻香村买“八大件”送节礼,包装要土纸加红,或者竹篓。

北京人少吃汤圆和酒酿圆子。他们喜欢滚粉的元宵。不必细腻,一定要“混沌”,可能跟他们的“宇宙观”有关。

济南人喝敬啤,北京人喝扎啤,老外喜欢青岛啤酒。泡吧的人喜欢Budweiss、Heineken。中外在一起来要喝巴伐利亚黑啤酒。

北京人西餐喜欢去北京展览馆“老莫”,雅宝路的都无法代替。有一年春节我去翠微路的“基辅”,也不错,有俄罗斯味道,但它还不属于“老莫”的那种怀旧,那里有“苏联老大哥”的阴魂,70岁以上的人喜欢那里。

西客站原来有家“红玫瑰”餐厅卖烤羊肉,好吃。拆迁了。要想吃点新疆饭得去马连道“兵团大厦”或者牛街的“吐鲁番”。吐鲁番餐厅对过有极价廉物美的砖茶摊,吃完羊肉你带回家一块煮茶喝,暖胃,又不脱肛。

北京烤鸭现在是游客的“专利”,北京人倒难得一吃了。20年前朝阳门的“利得烤鸭”是梦里的乡愁,叫人牵肠挂肚,尤其是空肚子写稿的时候。

北京人的吃不在乎席面大小,所吃雅俗共赏,如“心里美”萝卜。偶尔来一碗碴子糙米粥,来一碟糟鹅掌,一个叠脂鸭胸,一个肉松粽,来一个榴莲酥,一个马蹄糕,一个萝卜丝饼,一卷肠粉,我们也不反对。

北京人少忌口,但需要食品档次;不讲究贵贱,但要吃得舒服;吃到脚麻木子都感觉舒坦,才不管你“河豚”多少钱一斤呢。贵而不爽,余不取也。贱而可口,哪怕是“六必居”的酱瓜。

年拍摄的《麦秋》放进了碟机,不想竟然一口气看完了这部缺少“戏剧性”的、两小时长的电影。我道行浅,没有从小津的电影中悟到德勒兹所说的“纯视听的情境”,反倒臆置了浮躁的情绪,如参禅悟道般让自己的心地沉寂了两个小时。

自此我疯狂地迷上了小津,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他的电影和评论书籍,还信誓旦旦要写一本关于小津的书。目前关于小津电影的评论几乎形成了固定的“谱系”,诸如固定镜头、低机位、空镜头、人物形似构形,体现了东方绘画的留白艺术和禅宗境界。我起初也为这些说法着迷,可后来却对这些过于理论化的说法产生了质疑,看小津的电影越多,越说不出好在哪里。

日本的导演对小津的评价形成两个极端。像今村昌平,年轻时做小津的副导演就不喜欢小津,晚年还是讨厌小津的电影,而山田洋次和吉田喜重在年轻时对小津多有批评,晚年却推崇备至。

2013年是小津诞辰110周年、辞世50周年和《东京物语》诞生60周年,山田洋次把《东京物语》翻拍成《东京家族》以纪念它。《东京物语》讲述了一对老夫妻到东京探望儿女,儿女忙于自己的生活,无暇照料,最终夫妻俩又返回老家,多少反映了日本战后的社会景象。《东京家族》把时间定位在2012年,反映了日本“大地震”和近年来经济低迷的社会景象。

《东京家族》从老夫妻到东京开场,而《东京物语》的开头还有一段夫妻俩准备行装的段落。妻子问丈夫,旅行用的气枕装好了吗?丈夫说:“我不是给你了?”妻子说:“我这里没有呀!”过了一会儿,丈夫说好好找找,结果发现在自己的提包里,妻子说:“有了吗?”丈夫说:“有了。”随后两人继续收拾行装。

吉田喜重写过一本《小津的反电影》的书,以《东京物语》中的这个场景开始分析小津的电影。他认为在这个场景中,不是老夫妻在寻找气枕,而是气枕在“凝视”这对老夫妻,这在小津的电影中很有代表性,也就是说,小津电影的视角不是哪个人物的视角,而是“物”的视角,仿佛上苍在“凝视”芸芸众生,这就带有了“超验”或宗教的意味。

我也很喜欢《东京物语》中的这个段落。倘若中国的电视剧中发生这种事,肯定是夫妻双方相互抱怨,从而引发一场“战争”甚至离婚。我们往往用“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形容夫妻的好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夫妻双方不再对彼此抱有“幻想”,这才会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争执或抱怨。这是小津对生活的态度,也是他的电影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那位日本朋友起初到中国留学,后在中国的大学做外教。他说日本社会已经失去了活力,而中国则到处充满了生机,所以他决定留在中国。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异域的印象”。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

(节选自凤凰网网见,2014年2月23日)